

走出瓶頸：澳門歷史研究現狀與前瞻

湯開建

[提要] 本文就澳門歷史研究現狀中存在的碎片化與系統化的矛盾、史學理論的取捨與應用、路徑選擇與空間拓展等問題進行了論述，而且提出未來澳門歷史研究存在的最大問題即葡文文獻的整理與翻譯。文章認為，目前的葡文文獻整理與翻譯，滯後於澳門歷史研究的發展，並已成為了澳門歷史研究發展的嚴重障礙。因此，作為國際澳門史研究主陣地的中國學界，作為澳門歷史研究主體對象的澳門地區，有責任有義務去組建一個澳門歷史檔案文獻翻譯中心，重點立項，加大投入，中國專家與葡萄牙專家結合，澳門史專家與葡語專家結合，系統地翻譯 16~20 世紀中西關係中的葡文檔案文獻及澳門問題文獻。集全球澳門文獻於澳門，供源頭活水予國際澳門學界。

[關鍵詞] 澳門歷史研究 葡文檔案文獻 整理與翻譯

[中圖分類號] K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3)02-0024-07

澳門歷史研究應始於葡萄牙人弗雷塔斯（Guimarães Freitas）炮兵上校於 1828 年出版的《名城澳門史實記錄》。^①雖然該書不如稍後出版的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門史》影響大，但它卻是西方學者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研究澳門歷史的學術著作。在此之後，龍思泰《早期澳門史》（1832），聖塔倫子爵（Visconde de Santarém）《關於澳門居留地備忘錄》（1845），馬雅（Maya）《澳門開港回憶錄》（1849），桑帕約（Manuel de Castro Sampaio）《澳門的華人》（1867），庇利喇（Marques Pereira）《澳門大事記》、《澳門的中國海關》（1870），費爾南德斯（J. Gabriel B. Fernandes）《澳門歷史劄記》（1883），弗蘭薩（Bento França）《澳門歷史補遺》（1888），徐薩斯（Montalto Jesus）《歷史上的澳門》（1902），波乃耶（J. Dyer Ball）《澳門·聖城·東方寶石》（1905），矢野仁一《明代澳門的貿易及其興衰》（1918），科龍班（Eudore de Colomban）《澳門歷史概要》（1927），伯希和（Paul Pelliot）《澳門的起源》（1935），張天澤《明代中葡貿易考》（1935，英文博士論文），藤田豐八《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1936）等一系列澳門歷史研究著作先後出版。到 20 世紀 40 年代以後，更掀起了以博克塞（C. R. Boxer）、白樂嘉（J. M. Braga）、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enjamin Videira Pires）

等人為代表的澳門歷史研究的高潮，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文獻、檔案及一批高質量的澳門歷史研究學術著作。這一時期的澳門歷史研究，可以說完全是屬於西方的，其間雖有少部分中國學者的參與，但不論從數量與質量上，中國學者的研究尚屬起步階段，多偏重於一般性的介紹或敘述。因此，基本可以說這一時期中國學者在國際澳門歷史研究的領域中，沒有多少話語權。

20世紀70年代以後，海外中國學者以全漢昇《明代澳門的海外貿易》（1970）、郭永亮《明季澳門與日本之交通》（1971），霍啟昌《澳門模式：16世紀中葉至鴉片戰爭時期中國政府對西方人管理辦法研究》（1978，英文博士論文）為代表，國內則以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1980）和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證》（1981）為發軔，直至1990年代中後期，進入了中國學者全面介入澳門史研究的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學者澳門歷史研究成果的量遠遠超過了西方學者，但是，從對原始資料的挖掘及研究的深度來看，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相比，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特別是受澳門回歸的政治影響，中國學者龐大繁雜的研究成果，良莠不齊，其中利用中文資料、發揮中文資料優勢的成果，明顯具有創新性，特別是中文資料的搜集與整理，使中國學者在國際澳門歷史研究中佔據了一席之地。但是，大量的應景之作、草率之作、非原創性之作十分突出，存在著嚴重的學術泡沫與學術失範。余以為，如果從嚴格的國際學術規範要求的澳門歷史研究的深度、廣度而言，這一時期中國學者從整體上尚未進入國際學術研究的前沿。

1999年澳門回歸以來至今，這是中國學者澳門歷史研究前所未有的最好時期。雖然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數量比上一時期明顯減少，但就成果的質量而言卻有很大的提高。研究視野不僅僅停留在16～17世紀澳門早期歷史，而且逐漸下移至18世紀後的澳門歷史，即針對澳門近現代史展開了下了力氣的研究。除去回歸政治效應的騷動後，中國學者不論在文獻整理還是專題研究，都出現了較高水平的專業論文與著作。針對葡人東來及澳門開埠前後一系列學界長期爭論但又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中國學者展開了深入細緻的討論，如Tomão、茜草灣、雙嶼港等歷史地理問題；又如葡人驅盜入澳、中葡早期和約、媽閣廟的起源、廣州交易會、葡西征服中國計劃等問題，這些論著不僅能竭澤而漁地網羅中文史料，而且亦在大規模挖掘、整理葡文資料的基礎上，展開了新視角的澳門歷史研究，澳門史研究進入最為精彩的歷史階段，出現了越來越深入、越來越細化、越來越詳盡、越來越精到的研究局面，很多學術成果已經趕上和超過了西方學者的研究水平。特別是澳門基金會組織及資助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澳門叢書及已經完成的兩部規模宏大的學術專著：《澳門史新編》和《澳門編年史》，更是代表性地體現了這一整體水平。尤其是後者，無論是從中西檔案的徵引上，還是在專題個案的考證上，都超過了以往的澳門歷史研究著作。即使在西文資料的使用上，也超越了以往的西方學者，被著名漢學家普塔克（Roderich Ptak）教授譽為“一部現代版的澳門實錄”，當之無愧為近期史學研究的里程碑^②，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學者澳門歷史研究最為重要的代表性成果。至此，可以說，中國學者在國際澳門歷史研究領域中獲得了自己的話語權。

二

然而，回望百年澳門歷史研究的演進過程，可以看出，澳門史研究呈現出從學術失範到學術守範，從宏大敘事到史實考辨，從通史性作品到專題性研究，澳門歷史研究完成了由粗糙到精細、由淺層到深層、由一般描述到史論結合的主觀闡發過程。應該說，獲得的成績是可喜的。但百餘年來的澳門歷史研究發展到今天，並非盡善盡美。余以為，以澳門歷史研究的現狀而言，存在的

問題及弊端還很多，既有學科基礎理論建設的不足，也有研究方向、方法上亟待檢討的地方。

首先，澳門歷史研究碎片化與系統化的矛盾。

對於一門學科而言，研究者是否把握學術思想史中問題意識的序列，或者自己的研究背後的問題意識是否具有邏輯上的連續性^⑧，本質上是決定學科進展和學術推展的基礎，是決定能否提出有價值問題的關鍵。澳門歷史研究也不例外，尤其是逐漸擺脫包括政治在內的外部因素干擾，進入澳門區域社會自身演進的學術探討，近年來愈發凸顯區域社會研究的人文主義趨向。與此同時，雖然澳門歷史研究摒棄了前期宏大敘事的粗淺形式，進入精細化的新階段，但我們學術研究隨之而面臨碎片化的困境。大量的瑣細考證文章佔據了澳門歷史研究的主體篇幅，而成熟的系統化的專題學術研究，成果較為少見。當然，“碎片化”是當前歷史研究的普遍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和《歷史研究》編輯部連續多次召集學者探討這一問題，呼籲學界努力擺脫碎片化的不利影響。基於此，我們先後完成《澳門史新編》、《澳門在16～19世紀西學東漸中的地位和作用》、《澳門近現代城市發展史》、《澳門近現代工業史》、《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研究》等專題性學術工程，以期在回顧前史、探索新路上有所斬獲。如何處理碎片化與系統化兩者的矛盾，關鍵是要提出有價值的問題及這些問題意識背後的邏輯上的連續性。針對澳門歷史研究的特殊性，就澳門一地、一名、一詞的詳細考證，是澳門歷史研究前期必須完成的最先步驟，但我們不能始終停留在這一地、一名、一詞的瑣細考證上，在眾多的瑣細考證上如何展開系統化的專題研究，即是中國學者面臨的一大難題。我們既反對鋪天蓋地的碎片化研究，但是我們更反對缺乏扎實基礎研究的所謂系統化的空泛之談。碎片化考據與系統化研究的結合，應該是一個有層次有步驟的有機過程，這是當今澳門歷史研究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但目前尚未盡如人意。

其次，澳門歷史研究中史學理論的取捨與運用問題。

有論者指出，在短短的20年間，中國史學家面對國際史學界在一個世紀理論探索中經歷的巨大變化，不同階段的東西混雜在一起湧入腦際。實證主義、總體史觀、後現代主義等史學思潮蜂擁而至，新制度史、新文化史、概念史等史學新方向席捲而來^⑨，如何在已有成果基礎上有選擇地推進澳門歷史研究，擺在眾多學人尤其新一代研究者面前。在當前條件下，要求研究者具有更為清醒的自覺意識，以免墮入繁雜紛紜史學觀念的“陷阱”之中。有所選擇，務必考鏡源流，理清脈絡，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新理論的不斷湧入，讓我們發現在政治經濟研究之外眾多“盲點”，比如關於殖民意識、都市文化、城市景觀、公共空間、市民精神、族群關係、性別分工、身體政治、地域認同等等。然而如何釐清這些理論適用的邊界與尺度，如何連結傳統與現代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是我們當前研究者務必警覺的。新理論提供不少新思路，提出不少針對傳統史學的質疑，然而並沒有也無法根本上否定傳統史學，而且也沒有能夠完滿回答自己的問題。研究者能否做到知其源流，取之有道，既是評判研究者學術操守的標準，也是檢驗研究者學術功力的試劑。接受新理論帶給我們的新理念新思路，再結合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來的優秀史學傳統，可以想像，未來的澳門史研究將呈現出新舊雜糅、一體多元的新景象。

第三，澳門歷史研究中的路徑選擇與空間拓展。

以往學者已經注意到澳門歷史研究應走出中葡關係的舊有框架，走向澳門區域環境及內在機理的“總體史”研究。在澳門歷史研究向澳門學嬗遞過程中，這些近乎“口號式”的提法，已遠遠滿足不了學術發展的步伐及期望，要求我們從更深層次思考澳門歷史研究的內在理路及研究空間。（一）澳門近現代史研究還有不少可拓空間。澳門史研究應向近現代史領域拓展，而且澳門

近代史的主體文獻尚存於澳門及世界各地檔案館之中，學術研究的空白領域還大量存在，前景廣闊，大有可為。與此同時，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一部澳門近代史，主要記錄的就是澳門華人史。因為從 16~19 世紀澳門葡萄牙人在中西經濟文化交流中創造的輝煌歷史到鴉片戰爭以後幾乎已經消退，鴉片戰爭後雖然葡萄牙人仍然在澳門政治上佔有主導地位，但在最起決定影響作用的社會經濟生活中，澳門華人逐漸由客體變為主體，成為澳門社會最受人關注的一部分。因此，一部澳門近代史，記錄的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華人的興起、衰敗、榮耀和恥辱。截至目前，婁勝華之於澳門早期社團，趙利峰、胡根之於近代博彩業，林廣志之於近代華商與華人社會，李長森之於近代外報業，均致力於澳門近代檔案文獻的開拓、搜尋及辨析，多能發前人所未發。但截至目前為止，澳門近現代史的研究與早期澳門史的研究相比，不論是質與量，仍存在著比例上的嚴重失衡。

（二）專題式研究還有不少可拓空間。除以往提出重視澳門中期史、澳門近現代史研究外，我們應更深層思考諸多歷史結構的不同層面。除現在已經推進的政治史、法制史、軍事史、宗教史、教育史、經濟史、博彩史、人口史、城市史、建築史、醫療史、文化史、文學史、體育史、戲曲史、繪畫史、郵票史之外，需要深入開掘的尚有工業史、商業史、金融史、典當史、貨幣史、家庭史、警察史、思想史、觀念史、風俗史、交通史、旅遊史、街道史、娼妓史等等。已推進的專門史成熟完善者不多，尚未展開者則需專門家深入探索。（三）進一步從新的層面拓展澳門歷史與社會內在機制的研究，可從宗族、族群、宗教、市場、社團等文化機制探討澳門社會的整合，從人口遷移、經濟變遷、族群互動等更高層面析究澳門現象的成因。這似乎是從人類學或社會學角度考察澳門社會的橫切面轉向縱向面，然而此並非簡單的從橫切面過渡到歷史的維度，以華南地區宗族研究為例，從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遞進到科大衛（David Faure）^⑤的文化過程考察，也是歷經幾代學人的探索。這種研究方法是否適宜於澳門，似乎尚未有人嘗試？（四）口述歷史及民間文獻搜集。澳門的口述歷史十分發達，既有以“澳門掌故”為形式的舊式口述歷史，也有以田野調查、上門採訪為手段的新型口述歷史。口述歷史在澳門的傳統悠久，且數量龐大，是澳門歷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大門類。但現存的口述歷史很難說其撰寫方法、調查採訪手段是科學的，故在大量的澳門掌故及口述歷史中存在著真假雜糅、虛實相間的情況，很多史實與歷史文獻、檔案的記錄差距甚遠。直至新近由澳門基金會與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一套類似於“新口述史”的“澳門知識叢書”，仍然存在著上述問題。因此，如何規範掌故與口述史類著作的撰寫，如何使掌故與口述史進一步科學化，亦是澳門歷史研究中應予重視的問題。

三

澳門歷史研究發展至今日，最大的問題與隱憂還不在上述幾項。總結以往澳門歷史研究的經驗，如果還是那樣不痛不癢的寫幾篇文章，“海納百川”地拼幾本大雜燴式的著作和論文，已經非常不利於澳門歷史研究的發展。以余所知，已經公佈的中西文獻檔案，絕大部分已被人們闡釋解讀，凸現的重要問題在已浮現的資料面上大多清晰。如再不啟動大規模的西語文獻翻譯工作，還是零零星星地翻幾則檔案，譯幾段史實，我們將只能停留在歷史的碎化和真相的表層。沒有 16~20 世紀西語文獻檔案中澳門資料的徹底清理，一切談“澳門歷史”的研究者只能是片面的、膚淺的，甚至可以說是危險的。非如此，澳門歷史研究無法繼續深入往下走。鑒於此，余以為，西語文獻檔案翻譯資料的短缺，實際上已經成為澳門歷史研究進退維谷的“瓶頸”。我不想危言聳聽，但我希望我的話能引起不管是理論派還是史料派的重視。

解決“瓶頸”的關鍵，即是中西文檔案文獻的搜集、翻譯及整理。澳門歷史研究中出現的困頓與異化，其根源在於材料的單一與斷裂。大面積、長時段的歷史時期，並無第一手資料的支撐，故形成眾多澳門歷史時期的斷層。即使是研究“香火”十分鼎盛的早期澳門史，其間的空白和缺略仍然不少，甚至留下了許多永遠無法解開的“歷史之謎”。

過去，我們在中文檔案文獻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已經做出很大的成績，出版了大量的中文文獻檔案資料：《澳門專檔》（四冊，1992），《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1998），《中葡澳門交涉史料》（1998），《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六大冊，1999），《廣東澳門中文檔案史料選編》（1999），《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兩冊，1999），《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錄：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2001），《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2002），《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2003），《〈香山旬報〉資料選編》（2003），《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中文）》（2009）。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使命。當然，澳門中文資料還有可發掘的餘地，近來不斷有反映澳門早期歷史的新中文資料被發現，如明代韶州同知劉承範之《利瑪傳》^⑥，還有《申報》、《華字日報》、《華僑報》、《市民日報》、《世界日報》、《西南日報》等近代報刊中的澳門資料正在整理中。

西方文獻檔案中澳門史料的翻譯以往已經做了一些，但卻差距甚遠。已刊出的翻譯材料主要有：吳義雄等人譯《早期澳門史》；黃鴻釗譯《歷史上的澳門》；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何高濟譯《16世紀南部中國紀行》；金國平譯《遠遊記》及《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程紹剛譯《荷蘭人在福爾摩沙》；何吉賢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陳用儀譯《澳門尋根》；蕭濬華譯《16世紀天主教在華傳教志》。另有兩本最為重要的澳門史料譯文集：一是羅理路主編、由澳門文化局組織多位專家翻譯的《16~18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中的中國景觀》，其中搜集了28種極為珍貴的16~17世紀葡國文獻中的澳門資料；二是金國平選編翻譯的《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幾乎搜羅了15~16世紀葡語文獻檔案中與澳門相關的全部資料並進行了準確的翻譯，對於澳門史研究具有極高的價值。以上所列文獻翻譯材料，無疑已成為今天的中國學者研究澳門史的重要參考，特別是對於16~17世紀的澳門史研究而言，幾乎是不可或缺的。相對早期歷史而言，澳門中期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明顯要薄弱許多。現行的澳門史著作一涉及到17世紀中葉以後的澳門史，除了中葡關係，往往不見澳門本身的内容。究其原因，在於中文原始資料的貧乏以及葡語文獻檔案的整理翻譯與歷史實際差距太大。過去西方的澳門史研究者並沒有將澳門史置於中國史的範疇之內進行探討，而視之為世界史、歐洲殖民擴張史的一部分，以致於中國學者在澳門史研究中幾無發言權，其根本原因就是語言的阻隔。澳門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即使在葡治時期，中國政府對於澳門的主權也是不可否認的，況且本地區的生活主體一直是華人，澳門史當然是中國史。而澳門歷史研究具有其特殊性，因澳門在16~18世紀一直充當著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西方人在澳門的彙聚，保存了包括中、葡、西、荷、法、英、日、義、德、拉丁、越南、泰等多種文字的文獻、檔案及史料。世界上沒有一位學者能同時精通或使用上述各種文字，即使是語言功底較強的歐美學者也不例外，尤其是對於比較專業的中國文獻和史料，經常出現千奇百怪的解讀和注解。對於中西方學者而言，澳門歷史研究皆要借助於翻譯，這是一個誰也無法避離的不爭事實。

發展全球學術視野下的澳門歷史研究，必須將西語檔案文獻整理與翻譯落實到操作層面，而

不能僅為口號和概念。然而，澳門歷史研究中西語文獻檔案整理翻譯工作相較澳門歷史研究的發展而言，其速度是滯後的。翻譯資料更新速率滯後，同學界日益增長的關注度和投入度形成尖銳矛盾。新材料之發掘、整理與翻譯，處於澳門歷史研究的上游，承擔著為學者們提供原料的重任，但卻存在著專業人才、專項資金及組織機構缺乏的問題。直至“澳門學”發展繁榮的今天，澳門政府、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以至中國的“澳門學”研究的各學術團體，均未曾組建過一正式的翻譯機構，甚至仍將建立這種翻譯機構視之為可有可無。因此，幾乎所有澳門歷史的下游研究者，均將陷入一種“無米之炊”的景況之中。鑒於澳門歷史研究上游一直存在的斷水危機，在翻譯問題上，如果我們還是保持原有的方式和速度，從已面世的檔案文獻中摘取材料，加以斷章取義式功利性的零散翻譯，若不啟動大規模有組織性對16~20世紀葡、西、荷、法、英、義及拉丁等語種中關於澳門及中西關係的檔案挖掘整理，若不組織相當的人力下大力氣對這些西語文獻檔案展開系統翻譯，澳門歷史研究可以休矣。說得殘酷一點，對中國學界的澳門史研究者而言，不使用新的葡語翻譯資料，可以說，其後之研究是難以突破的。

據統計，現存於澳門歷史檔案館的葡文檔案就有5萬餘卷，其資料總長度可達3公里，圖像檔案達6萬餘幅，其中包括：原存於葡萄牙阿儒達圖書館的《耶穌會士在亞洲（*Jesuítas na Ásia*）》全套62冊的手抄本；澳門議事會自1630年以來的3萬餘頁檔案；澳門仁慈堂從15世紀末至19世紀的358套檔案資料（卷宗和抄本）；其他還有民政廳、財政廳、教育廳、官印局、婚姻和死亡登記局、法院中保存的18至20世紀的葡文檔案數萬卷。這些檔案記錄了16到20世紀澳門歷史上發生的各種大小事件及法令法規，是研究澳門歷史極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除此以外，澳門自1822年《中國之蜂》葡文報刊誕生以後，至20世紀上半葉，在澳門創辦的各種葡文報刊數以百計，特別是1838年創辦至今的《澳門政府憲報》，更是研究澳門近代歷史的史料淵藪。而這裡面所保存的葡文史料基本上未為中國學者所利用。面對如此浩瀚的葡語史料，如果沒有葡語的翻譯，如果我們不能準確地對這些葡文檔案、報刊加以利用，我們的澳門歷史研究可以讓人相信嗎？我們的澳門歷史研究能稱得上科學與客觀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2010年10月澳門利氏學社組織大量的人力、物力，將沉睡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300餘年的《北京大事記》^①手稿完成轉錄及注釋翻譯工作，並準備出版。《北京大事記》是耶穌會紀理安（*Kilian Stumpf*）神父在北京擔任庶務和文書之職時，收集鐸羅（*Maillard de Tournon*）使團來華及離華以後有關耶穌會的文件、書信及報告，自1705年12月起，至1712年5月止。該文獻不僅提供了大量系統的禮儀之爭及羅馬教宗和康熙皇帝之間複雜關係的珍貴記錄，還讓世人瞭解到清朝宮廷政治及不太為外人所知的宮廷生活，更使學界獲取到進入清宮的西歐傳教士在宮內的生活及活動材料。這些史實均是現存漢籍文獻檔案所不能提供的。利氏學社之壯舉，當為學界發掘、翻譯和整理文獻之絕佳表率。可以說，《北京大事記》的整理翻譯出版，將對清代天主教史、清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及清史研究提供極為珍貴的資料，亦可給上述研究帶來新的突破和發展。

再以余新近完成的《澳門工業發展史稿》^②為例，欲僅僅憑藉中文資料來撰寫澳門工業史的話，幾乎為無米之炊。以往的學者，在談到工業史時，只是三言兩語，不斷重複，其根源即在於缺少西文尤其是葡文資料的支撐。而此次撰寫過程中，余組織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對《澳門年鑒》（*Anuário de Macau*）、《澳門指南》（*Directório de Macau*）、《澳門憲報》（*Boletim Oficial de Macau*）及澳門民政廳檔案中相關內容進行了翻譯，方使著述繼續，不致馮河暴虎。可以說，沒有大量葡語資料的翻譯，就不可能有《澳門工業發展史稿》的完成。雖然，余近年來一

直在呼籲和組織習葡、西、法等語言的專家及學生在這一方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也投入了不少人力及資金。但，憑一個人的力量，而無實力雄厚的組織機構大規模介入，澳門史研究西語翻譯的“斷水”危機是無法從根本上予以扭轉的。

國內澳門歷史研究學界，若要走出當前面臨之“瓶頸”，使得澳門歷史研究繼續深入下去並走向繁榮，必須組建專業的檔案文獻翻譯機構，必須投入相當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必須有步驟、有計劃地將全球澳門史料的搜集、整理及翻譯工作落到實處。海外的澳門歷史研究者早已認識到檔案文獻翻譯及整理工作的深遠意義，並已身體力行地投入進來。作為國際澳門史研究主陣地的中國學界，作為澳門歷史研究的主體對象——澳門地區，有責任有義務去組建一個真材實料的“澳門歷史檔案文獻整理翻譯研究中心”，重點立項，大力投入，中國專家與葡萄牙專家結合，澳門史專家與葡語專家結合，著重系統翻譯16～20世紀中西關係中的西文檔案文獻。今後，那種葡文文獻檔案零敲碎打式的翻譯工作，不能再繼續，一定要在政府、基金會、大學等單位領導下，組織澳門、廣州、北京、上海與海外葡語專業人士及澳門史相關專家通力合作，按系統、分步驟、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至此，方可集全球澳門文獻於澳門，供源頭活水予國際澳門學界。若計劃果能如此，澳門歷史研究方能走出現今的“瓶頸”，方可獲得大有可觀的前景。

①以往，均將龍思泰《早期澳門史》視為西方人研究澳門歷史的第一部著作，這種說法並不準確。從時間上講，1828年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的《名城澳門史實記錄》比龍思泰書早4年。因此，我們應該訂正舊說，將第一部研究澳門歷史的學術著作的榮譽歸之於弗雷塔斯。參見（葡）蘇一揚（Ivo Carneiro de Sousa）：《前工業化澳門的居民及其人口體系（16-19世紀）》，載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3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1021～1022頁；（葡）塔維拉（Tomás Taveira）：《澳門港從開埠至20世紀70年代社會經濟和城建方面的發展》，澳門：《文化雜誌》，第36～37期合刊，1998年。

②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明中後期》，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序二》第4頁。

③④趙世瑜：《傳說·歷史·歷史記憶——從20世紀的新史學到後現代史學》，北京：《中國社學科學》，2003年第2期。

⑤莫里斯·弗里德曼是漢學人類學家最傑出的代表之一，曾先後出任倫敦大學、耶魯大學、康奈爾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及牛津大學教授，他最有名的著作都是研究華南宗族的：《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1958年），《中國宗族與社會：福建和廣東》

（1966年），創新性地使用漢學人類學的經驗來反思人類學的一般理論。科大衛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代表作為《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2007年），重點關注當代華南宗族社會研究。

⑥新近由肇慶市質量監督局劉明強先生公佈的湖北監利存澤堂《劉氏族譜》（民國三年刊本）序之卷2《藝文》中保存的明劉承範《利瑪傳》，該書保存了中國早期天主教史及澳門史的極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填補了澳門開埠早期史研究的許多空白，甚至解決了一些早期澳門史懸而未決的問題，意義十分重大。

⑦《北京大事記》（*Acta Pekinensia*）是一份長達一千四百多頁的手寫報告，組織了包括澳門利氏學社在內的多個專業機構的國際團隊，分三個層次：原始拉丁文獻的轉錄；文獻注解；文獻的網上轉錄。澳門利氏學社主要負責文獻的英譯工作，預算約為100,000美元，為期三年。

⑧2011年澳門文化局獎學金基金項目，研究課題為“澳門近代工業研究”。

作者簡介：湯開建，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 劉澤生]